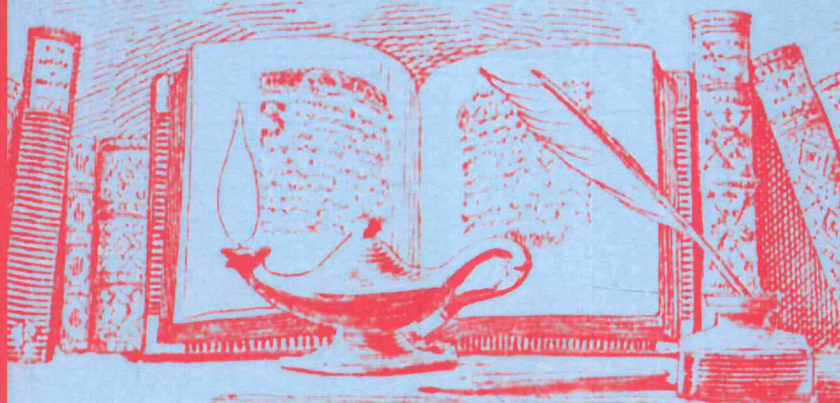


吴波
主编



Editing
is a disappearing art

编辑是一门 正在消逝的艺术

当手机阅读、网络阅读席卷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市场时，编辑该清楚，这是一场介质的革命，而非内容的死去。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吴波
主编

Editing
is a disappearing art

编辑是一门 正在消逝的艺术

当手机阅读、网络阅读席卷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市场时，编辑该清楚，这是一场介质的革命，而非内容的死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编辑是一门正在消逝的艺术/吴波主编.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55-0638-8

I. ①编… II. ①吴… III. ①编辑工作—研究 IV. ①G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7982号

Copyright©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编辑是一门正在消逝的艺术

作 者	吴 波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638-8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编者前言

编这本书的缘起，是要给刚入行的青年编辑们找一些可以借鉴的案例。我一直认为，编辑是一份和经验密切相关的职业，在技术革新覆盖绝大多数产品的时代，这份职业是需要手把手的传授及心甘情愿的自我揣摩的。

在一大堆出版人的回忆录或文集中，选出了书中这些文章。选完确定好这些篇目后，再来写这篇前言，那感觉就好比是一个已在路上的行者，面对刚开始出发的人，突然觉得光凭几句话几番注视，是说不清为什么上路，路上有哪些风景或陷阱的，只能默默地留下一本索引。在这本索引的背后，有诸多的故事以供挖掘。

本来，阅读一份尚未出版的作品，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然而，现在很难说会有多少人对编辑的工作发生多大兴趣了吧。就算身处出版业的人们，关注得更多的，也是卖点、市场、盈亏。我并非认为这些不重要，但那些影响图书出版的核心因素，渐渐变成了次要的、可有可无的东西。毕竟，在商业规则的考验下，那种手拿红笔、仔细审读手稿的对文字痴迷的编辑，早已让位给纵横市场、只会出版畅销书的企业家形象了。

但这也许只是聚光灯下的表象。正如郑振铎在本书《编辑是什么？》一文中强调的那样：“拿笔杆的人们，实在并不曾忘却他们的力量与责任。他们相信，人类社会之需要智慧也正和他们之需要食粮一样的迫切。”

那么，出版是什么？编辑是一份怎样的职业？随着时间的流逝，答案将会有不同的走向和可能性。然而，在所有的走向和可能性之中，有一些必将是核心的、炽热的、能一直鼓舞着向往这个职业的人们。它们是什么呢？

是的，编辑是需要耐心和技艺的。以书的出版为例，英国《卫报》上登过一篇《编辑是一门正在消逝的艺术》：作家米勒曾收到一封长达二十多页的编辑回信，信中“充满了绝佳的建议”，从年代错误、前后不一致到不恰当的语言运用。米勒采纳了大概 80% 的修改建议，然后再交给这位优异的编辑，并在接下来的四次校对中完善了书稿。“我完全被整个出版过程给鼓舞了，”他说，“我完全明白了为什么一本书从代理到出版商再到书店再到读者手中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了。我想有我这种疑问的人不在少数。”

是的，编辑也常常会在科技的嬗变中迷失。但一位有眼光的编辑，总能在这种变迁的同时感受到出版面临的机遇。当手机阅读、网络阅读席卷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市场时，编辑该清楚，这是一场介质的革命，而非内容的死去。正如台湾出版人郝明义所说的那样，任何时代的阅读，都很难绕过“分享”“人性”和“社群意识”这些关键词。

是的，编辑是需要勇气的。若你读过胡愈之 1932 年在《东方杂志》上发出的关于征集梦想的史料，读过沈昌文先生回忆刊登李以洪《人的太阳必然升起》的故事，读过钟叔河先生讲述策划《走向世界丛书》的经历……也许便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在一篇好文章、一个好报道、一本好书的背后，出版人除了要有见识和才华，还要有勇气。他们要清楚，在提供阅读的内容时，将会与社会及历史发生怎样的碰撞。

于是我们能理解，一位有担当的编辑，却可能会遭遇风险。在缺乏民主的社会中，与责任相对应的正是风险。让我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挑出下面一段话来作旁证吧——《新莱茵报》的各个编辑的命运是这样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因在爱北斐特发表的演说而受到刑事追究；马克思、德朗克和维尔特，作为非普鲁士臣民，应该离开普鲁士；斐迪南·沃尔弗和威廉·沃尔弗要受司法追究：前者是因为没有履行军职，后者则是

因为仿佛曾在旧有各省里犯过政治罪行；今天法院拒绝了把科尔夫交保释放的请求……

而在本书中，你也能隐约了解到一些编辑的坎坷命运。

除了这种风险，编辑面对的，也不总是鲜花和赞誉。对于 20 世纪最伟大的编辑之一——哈考特出版公司的吉鲁，最大的遗憾便是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失之交臂。吉鲁的上司雷诺看不懂《麦田里的守望者》，问：“这个霍尔顿·考尔菲德是个疯子吗？”雷诺和哈考特管理层还担心出版《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一部叛逆小说，会影响出版社在教育界的形象（毕竟他们出版社的核心利益在教育类图书），便将书稿交给教材部审读，结果，教材部的结论当然是“不适合哈考特出版”。而吉鲁曾向塞林格保证，他一定会出版这本书，并握手为约。吉鲁后来离开哈考特，加入法劳·斯特劳斯出版社，担任主编，十五位著名作家也跟随吉鲁转到新社。谈到痛失这部影响巨大的文学作品时，吉鲁说，“我一生中从未这么愤怒和羞辱，这是我出版生涯中所受到的最大打击。”可以这么说，一个没有被拒绝过、没有对自己能力失望过的编辑，未必是一个完整的编辑。

是的，就是在这种碰撞中，编辑受时代精神的指引，也影响着时代精神的传播。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等丛书，便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文化繁荣的前提，除了产业政策的激励、资金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宽松的文化氛围。而这种宽松，不会是天赐的礼物，也不会是自然的产物，它源自于思想的奔突，依托于语言、文本的博弈和传播者的努力。毕竟，铁皮盒里的鲜花，若是缺乏阳光照射，生命力总是脆弱的。

而编辑，也许就是那个打开铁皮盒子的人。

Contents 目录

- 001 编辑是什么? 文 / 郑振铎
- 004 我怎样踏进出版界 文 / 张静庐
- 014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 / 楼适夷
- 032 我的编辑生涯 文 / 何家栋
- 041 编译的教训及办刊物的几个原则 文 / 邹韬奋
- 048 有感于编书三十年 文 / 陈子善
- 051 最理想的生意经 文 / 贝内特·塞尔夫
- 054 那一场追逐,把我的梦境染成蓝色 文 / 俞晓群
- 057 我和我的作者们 文 / 杨葵
- 065 我和拉丁美洲作家的交往 文 / 汤姆·麦奇勒
- 071 编辑工作者应有的作风与道德 文 / 曾彦修
- 079 论“驾驭”文字的艺术 文 / 陈原
- 098 编辑的加工、整理工作 文 / 刘元彦
- 117 编辑的甘苦 文 / 沈昌文
- 123 爸爸教我做科普编辑 文 / 叶小沫

- 132 编辑的悟性：书感 文 / 李昕
- 141 “编辑力”的养成之旅 文 / 周浩正
- 150 初到商务及《万有文库》出版的缘起 文 / 王云五
- 156 我为什么要编《走向世界丛书》 文 / 钟叔河
- 161 编辑怎样抓“好书” 文 / 胡守文
- 167 “好妈妈”是怎样炼成的 文 / 郑建华
- 175 探索世界奥秘之旅 文 / 阿尔·西尔弗曼
- 186 岩波茂雄和他的岩波书店 文 / 李长声
- 195 儿童图画书的出版体验 文 / 松居直
- 203 美国编辑怎样看待编辑工作 文 / 刘泉
- 209 凭什么要我们热爱出版业 文 / 吴波
- 214 编辑是一门正在消逝的艺术 文 / 阿历克谢·克拉克
- 226 出版的未来在于创新 文 / 麦克·亨德里克森
- 233 未来出版之配方 文 / 郝明义

编辑是什么？

文 / 郑振铎

郑振铎（1898—1958），祖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温州。现代作家、学者、收藏家、考古学家。主编过《文学研究会丛书》《儿童世界》《小说月报》《世界文库》等，历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以及多所大学的教授。

在这个急骤变动着的大时代里，我们的责任是不很轻微的。我们既醒悟了以前一切的错误，我们要策划着我们将来的正当的轨辙。

拿笔杆的人们，即向来被称为“士大夫”的一个阶级，在过去的无数年代里，确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享用着一般平民所未曾享受过的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权。一般民众都只有义务而无权利。而腆然自居于“四民”之首的“士”，却只有权利而无义务，他们一旦穿上了“蓝衫”，即一旦由农工商中被选拔出来之后，立即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不纳税，不服工役。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候补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朝为官，居乡为绅。这样的—一个阶级，在更远的时代，是贵族，而在二千年来便是“士”。

四民之首的“士”不仅握捉住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更还独占着人间的知识与学问。自诗人到经师，自医士到幕客，自治河到救荒，又无不是“士”的事业。“士”在享用了政权之外，还永占着社会上的宾与师的地位。

但一个大转变的时代终于到了。这个大转变的时代的到来，使“士大夫”的地位急骤的下降。他们整个的阶级逐渐的崩坏了；他们的种种特权逐渐的被剥削了；他们的独占的一切东西也——的被强让出去了。

他们由一个具有特权的统治阶级，一变而成为与一般民众无殊的“民众”之一部分；他们由崇高的宾师之位，跌落到成为普通的被雇者与自由职业者。他们由傲然自命的社会的柱石，一变而成为大社会中随波逐浪的平凡分子。

时代的推进，既使拿笔杆的人们失去了他们固有的崇高的地位，而同时因了新兴资本势力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高压，更使他们于失去了传统的傲慢之外，发生了新的自觉。拿笔杆的人们开始明白，笔杆与算盘、犁耙、斧尺等等是同一的谋生的工具，并不比他们更高尚或更能干。

他们明白传统地位与特权的失去，不仅不足以惋惜，还更能使他们认识了真实的社会地位，确实了人类的生存的意义，与乎共同努力的方向与轨辙。他们是由二千年来可羞耻的地位解放出来了。由于这个解放，他们才回复了“人”的正当生活。

这当然应该感谢我们的这个大时代。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又开始摆放在他们面前来。新兴的资本势力的压迫，使拿笔杆的人们又遇到一个厄运。这个厄运如今正在开始，要变什么式样，我们实难预料。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明白的，这种新的压迫，只能增加了他们向前奋斗的勇气，与更清楚的认识了自己的真实的力量与责任，并不能丝毫摇撼到他们的自信与生存。

老实说，拿笔杆的人们，实在并不曾忘却他们的力量与责任。他们相信，人类社会之需要智慧也正和他们之需要食粮一样的迫切；特别在今日文化落伍，知识未开的中国，拿笔杆的人们的责任，似乎比一切都更重要。一切科学知识，都未彻底的移殖进来，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还有待于将来的出现；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不识字的民众，正嗷嗷待哺的有待于最原始的启蒙运动的进展。这都使拿笔杆的人们不能不旦夕的感到“不足”，与发生要担负了这些启蒙运动与移殖事业的雄心的。为了人类，为了中国，他们都是不能放弃了这些明显的摆放在他们面前的责任的。

“编辑者们”只是拿笔杆的人们里的很微小的一部分人，但为力虽微，我们却也并不愿放弃了那些重要的责任，更不敢忽视了自己所担负的职务与力量。

我们，一部分的编辑者们，是在全国最大的一个出版机关里的。我们明白这个出版机关，由它的伟巨的印刷机上所播散出去的东西，是具有不能自知的伟巨的影响的。它可以发生了很大良好的影响，也可以产出无限量的有毒的丑类。在过去许多时代，它是战战兢兢谨慎小心的。它的动作虽并不很快，但却是时时都不愿意最小量的有毒之物传播给社会的。这是可自信的一件事实。

现在，在迫切的知识需要情形之下，我们更要使它充分的发展其可能的力量，以传播移殖重要的科学，文化的出版物与乎启蒙运动的书籍图表。我们更要就我们力所能及，督促监视着它，不使其为了“利令智昏”，而印刷任何有毒害的东西，我们要使它充分的善用其力。为了这，我们或许要不客气的批评当事者的举措——但却始终是站在我们的善意的督责的地位上的。

若有任何无理的新的压迫，凭借了资本势力而加到我们的身上，则我们更将不惜任何牺牲与之周旋；决不退却，决不反顾。而本刊¹便是我们的力量之一。但我们始终是要站在和平的立场上，低头的做着我们所应该做的工作的。

在这个急骤变动着的大时代里，我们的责任是不很轻微的。

¹ 这篇文章原是郑振铎为《编辑者》所作的发刊词，曾收入《海燕》一书。

我怎样踏进出版界

文 / 张静庐

张静庐(1898—1968)，浙江镇海人。曾参与创办光华书局、联合书店、现代书局、上海杂志公司。1949年后，历任上海联营书店总经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计划处处长、古籍出版社编审、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组组长。

我早想写成一部自传，赤裸裸地记述我二十多年来流浪的生活。并不是像名家或要人，可以印出来卖钱；目的是预备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后，人老了，做不动事，风瘫在床上的时候，翻看翻看，壮年时流浪生涯的写真，自己亲手摄成的一幕一幕的影画，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

但是，半因疏懒半因忙，自传到底没有写成。就是连写日记，也是时辍时作，没有连续地写满一年过。这回李公朴先生叫我写篇生活纪录，我很高兴答应了，预拟一个题目“我怎样踏进出版界”看来是很容易的，可是一提起笔来又感到麻烦了。“我怎样踏进出版界”呢？说来真是话长。因为我现在虽钻进在出版界里，从前却不是干这勾当的。我的天性是好动的，恰和我的名字相反。动的结果，廿多年来竟干过了很多的行业，真像我们宁波滩簧里的“马浪荡”¹，三百六十行，行行不落当。

我生长在一个商人之家，循着“商之子为商”的定例，我自然也该当一个买卖人。买卖人是靠经验吃饭的，不必多读书，多读会变成书呆子，就不会做买卖了。所以我从九岁上学，十四岁读完了初级小学后，

¹ 滩簧：清代流行于江浙一带的曲种；马浪荡：游手好闲之人。

跟着舅父到了上海，投在一家烧酒行里当学徒。当学徒原是很辛苦的，烧酒行的学徒也不能例外。顶吃重的工作是洗洋瓶，一天要洗净几千支，冬天蹲在自来水桶边冷得熬不住，偷偷地去煮点热水来取暖，自以为是聪明的举动，不料这一来不得了，十支手指，支支都皮腐肉绽，像个爆裂了的“风栗”。

从十五岁起，我开始爱看小书了。每天下午有个背蓝布包的卖书商，背了各色小书走到各店家里来卖。普通的小书也可以通融租看的。从这时候起，我每个晚上打烊之后，待师父们睡静，将电灯用旧报纸包着，扯到枕边偷看日间租来的小书。小书之后，继之大书——三国、红楼、水浒、隋唐、岳传等。同时特别喜欢读文言的小说。那时商务印书馆有恽铁樵¹编的《小说月报》，我是无期不买；倘有出版脱期的时候，竟会一天跑去三四次。工作也散了心，有人买五个铜板的烧酒，常会替他装满一洋瓶。整个的灵魂，遗失在商务印书馆的书柜边。

十六岁一年，刚逢二次革命，上海打仗了。父母爱子心切，叫乡人到上海来陪我回家躲祸。在我个人呢，已出门一年多，心野胆大，革命军打制造局原也不怎样可怕。只是奉父母之命已来陪我的一位热心人，一定要我跟他回去。当学徒三年没有满师，回家谈何容易，自然非得到东家及师父都同意了不可。出人意外，陪我的热心人竟同我的东家冲突了，你说不许走，他说非走不可，于是乎我就做了第一次的“回汤豆腐干”²。

第二年我又到上海来，改行做一家洋纸号的“过堂学徒”。洋纸号的工作，比起酒行来是写意得多，字号又没有门市，晚上休息也比较早。于是我的读文言小说的机会愈多了。最使我爱不忍释的，是王钝根先生编的《游戏杂志》；此外就是林琴南先生译的言情小说，一本又一本，

1 恽铁樵（1878—1935），浙江台州人，早年从事编译工作，后弃文业医。在民国初年发生的全面废除中医的运动中，是维护中医的代表人物。

2 回汤豆腐干：俗语，比喻回到原处或重操旧业。

这看小说在我仅次于吃饭的需要。同时也创作了很多篇的小说，向各杂志报纸投稿。有登出的，也有石沉大海的。刊登得顶多的是一家中外日报的副刊，编辑的是夏秋风。很不幸，这报纸短命夭殇。我的稿子愈多愈多，很怨望没有给我尽量发表的地方，因此，我便偷偷地向朋友处借到几十元大洋，居然自己办起刊物来。初出猫儿恶如虎，一下子居然出版二种杂志：一种叫“小说林”，一种叫“滑稽林”。印成之后，就亲自送到名报摊上委托代卖，没有回单，也没有批卖的章程，其结果，是二千本的杂志，送给卖报先生们吃点心。创刊号的成本，一个大子捞不回来，总算是完全亏本。这虽然是年轻人办杂志没有经验，但是那时候倘然已有了一家杂志公司，刊物的销路跟内容虽没有把握，卖出了刊物的血本，终多少可以捞回一二，再接再厉，我的杂志也许还有第二期出版的希望吧。钱送掉了，落得名利两空，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欠了朋友的钱又逼着要还，没办法，只得躲在一家同乡人开的洋布号里。待到家里得到洋纸号通告学徒失踪的消息后，母亲才从乡下出来寻我，同我一同回老家去。于是乎我又做了第二次的“回汤豆腐干”。

我办杂志的计划，虽然失败了。“我怎样踏进出版界”，这是第一回。我想我后来之吃“书饭”，也许种根于此，这草草的二本创刊号杂志，是我踏进出版界的引火线。

一个人的事业的成功，必须择其性之所近，绝对不许勉强的。我从小就爱掉笔头，做不三不四的小说，出杂志，买新书，都是因为性之所近。倘使做父母的替子女择业，就其性之所近，那么他的子女一定能够办成一个事业，显亲而扬名。但是中国为人父母的，不作如是想，叫子女干什么职业，是完全随他老人家自己的性之所爱；譬如他爱大洋钞票，他就叫他的子女进银行钱庄去做练习生，将来会替他挣他所爱的钞票，铸造他所爱的大洋钱。

十八岁那年，我完全在乡间度过。那时我认识与我有同好的朋友王公度，二个人就竞赛似的做小说，写笔记，向上海各种杂志里投稿。

稿件虽很多被编辑先生采登，稿费却从来没有领到一文。十九岁那年春季，我又奉父母之命到上海来到一家浙江路的酒店里充当外账房，每月薪俸是四元钱。绍酒一斤，汤面一碗，从早晨开门一直要开到晚上二点钟才打烊，足足有十八小时的工作。酒店的伙计们，叫小菜有一种特创的秘诀，叫起来用大嗓子唱一种特有的调，扰攘终日夜，人的脑子都被他噪昏了。可是说也奇怪，我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真像有特殊的天才似的，会每天伏在账桌上，写我创作的小说，快得很，一天便能写成一篇。出产多了，就异想天开，向外埠报纸去投稿。这时刊登我稿子顶多的，是一家天津的公民日报——华北反袁的国民党机关报。过了半年，我突然接到天津公民日报馆主人刘揆一先生的来信，问我愿意不愿意到天津去充任报纸的副刊编辑，每月薪俸是四十元。天呵，这是“航空奖券”的头奖呵，那有不愿意中奖的呆子呢！从这时候起，我开始踏进新闻记者的圈子了。袁死黎继，公民报搬到北京出版，我跟着到了北京，从副刊编辑改任新闻编辑。全报馆都是湖南人，独我一个宁波人，报馆的东家都是政客，独我是个没经世故的年轻人。所以每天除编辑新闻以外，就踱到陶然亭上去念书。从这时起，我为求适应编辑知识的充实，暂时抛开了小说迷，开始读不知所云的经济政治书。第一部使我摸到门径的，是马凌甫译的《国民经济学原论》。

张勋复辟的前夜，我回到故乡，结了婚，就应朋友王公度之召，到镇海觉民学校去当初级国文教员，月薪十二元。当教员是失业没事干的人才愿意干的（那时候当教员的人都是存着这样的心理），我是个好动的人，尤其不惯这冷板凳生涯。过了四个月，就辞职，随着一位亲戚到山东聊城县去做贩枣子客人。我只晓得枣子有红有黑，别的什么都不懂，当然又不会做成的。在某一个秋天的早晨，我独自骑着一辆羊角小车，离开了聊城，整整走了三天，才到济南，投到一家还没有开的转运公司里去当文牍。因为公司还没有开门，同事们都闲着没事做，于是跟着一班爱嫖的同事，闯到八卦楼的妓院里。我虽然没有

嫖的野心，但却也爱打几圈麻将。凑成一局，从下午打到天明，检算筹码，竟然输掉了三百多元。一个失了业刚得到了业的人，在公司还没有开，薪俸还没有定的时候，竟然在一个晚上输掉了他几年的薪俸，岂非是一件大大荒谬的事吗？当天刚天亮的时候，我推说出恭，便一口气跑到津浦车站买了一张三等车票，弃掉行李，不要名誉，三十六着，逃到浦口一家洋行里。这里有一位朋友的父亲在任经理，使我终身不能忘怀的慈厚长者郑敬友先生。他听完了我忠实的报告以后，并不怎样愤怒，仅用慈和的态度训斥了一番，就到下关商务印书分馆订了一口折子，交给我，说：“你暂时住这里吧。年青人应该多读心爱的书，要什么向商务去拿，书钱记在折子上，我会替你还的。”从这时起，我又重复读我爱读的小说——说部丛书和林译小说，十分之八在这个时候读完。

为了济南的不名誉的事，传到故乡；再加以失业家居，不会挣钱，只会吃饭，自然渐渐地给家里的兄嫂亲戚邻居们所瞧不起。母亲因生子不肖，也受了不少闷气。我气极了，我受不住亲友们的轻薄和侮辱，向姐姐处借到了三块大洋，重又漂泊到上海来。这一回是举目无亲，寄宿在一家小旅馆里，看看仅有的三块钱快要完了。这时刚接着北京的五四运动，上海掀起了一个六三运动，罢市罢工罢课，援助北京被捕学生，打倒媚外卖国的曹陆章。商界里有一部分血气方刚的青年，组织一个救国十人团，再联络各团组成一个总联合会，发刊一种救国日报。因为我曾经一度当过编辑的缘故，推举我充任这张日报的主编，每个月有二十元的车马费，总算又有业了。后来为抗争四路条约，各省民众团体通电反对，要推派代表到北京总统府去请愿。上海方面由学生联合会为主体，召集了一个各团体联席会议，我代表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参加，结果被推举为五省联合请愿团上海五代表之一。明知这是件与虎谋皮徒劳无益的事，但是年青人就管不了许多，终于到了北京，造成十月一日大闹新华门的血案。从早晨八时闯入东辕门，直到晚间

一时，奔走呼号，叫跳哭吵，在四面军警，刀出鞘，枪上刺的武装包围之中。一点钟以后，在人人筋疲力尽之际，每人五花大绑，捉进所谓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察厅里去。当时就过了二次堂，视请愿书列名之先后，作为犯罪之轻重，分成三组，分别送进监狱。不幸，我是上海来的，请愿书上的列名是依据距离北京路途之远近而定，例应写在第一列，就被认为有主唆嫌疑的罪犯。同样的，有九个重犯，装进一辆骡车，送进鹁儿胡同的侦缉队拘留所。这一晚，又过了二回堂，便百事大吉，不问不闻地，关在一间屋子里。一张土炕，一张破桌子，一方铁窗，两扇粗如圆棍的木栅门。北京的警察似乎比别的地方好些，他对于这样的政治犯，常常很客气地和我们攀谈，讲东说西，北京附近奇闻轶事等等，使我们有时也会忘却身居囹圄的痛苦。如此不明不白地关了三十多天，才奉到一条新内阁总理的命令，放了出来。经过了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的慰劳后，总究又失业了，不得不再回到故乡。正在忧虑的时候，宁波各界联合会派代表来请我往宁波去。承热心国事的会员们的推举，肩了宁波各界联合会代表名义，到上海来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政治活动。从这时起，我对于政治稍少感到了一点兴趣，时时去听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开始读《每周评论》，建设月刊；但同时仍旧想做小说，不过（自以为）比较进步些，在泰东图书局主编一种新型的月刊，叫做“新的小说”。那时北方虽然有了《新潮》，南方还没有新文艺的刊物，于是这（现在看来不值一文）《新的小说》，开辟了新路，居然每期销行三千多本。第二年，全国各界联合会被封，代表都逃散，我就因这小小刊物的因缘，第二次踏进出版界，充任泰东图书局的第一任的编辑，因那时泰东图书局还是“礼拜六派”¹式的书店，根本没有编辑部。从我进去了这后，才租了一幢房子，挂起编辑部的牌子，实际上还是只有一个人。后来再加入王新命、王靖二位。由王新命主

1 礼拜六派：民国时期文学流派。是“鸳鸯蝴蝶派”的余波，新月派的翻版。因以《礼拜六》周刊为主要阵地而得名，代表作家周瘦鹃、王钝根等，宣扬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文学。